

一、当今跨文化对话的紧迫性

目前,跨文化对话的进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因为:

第一,全球互联网、移动通讯使人与人之间的紧密沟通成为可能。转基因、干细胞、克隆等生物工程技术使生命可能通过人为的手段复制、改写、优选。而纳米技术使人类能够对微观世界的有效控制。这些革命性的新知识、新技术贯穿到人类生活的每一细节,导致人类对时间和空间都有了和过去根本不同的看法,也导致了对地球资源的空前消耗和争夺。人类所面对的现实,不是对抗,就是对话。对抗引向战争和毁灭,对话引向和平。

第二,对20世纪一百年经验的反思。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加以德国的反犹太法西斯集中营、俄国的“古拉格群岛”、中国的“大跃进一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残酷经验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重新定义人类状况,重新考虑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存方式。这种重新定义只能在全世界各民族的对话中进行。

第三,文化冲突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全球人类的未来。“文化霸权主义”和由文化封闭主义发展而来的文化原教旨主义的尖锐对立已经使全球处于动荡不安的全面战争的前夜。要制止这种冲突,不能通过暴力,只能通过对话。

第四,哲学的转向。20世纪前后,现象学和以怀特海为代表的过程哲学相继扭转了主体和客体可以互不参与的二元对立的倾向,使西方哲学进入了一个主体与客体互动的阶段。中国传统哲学从来强调客观世界与主体不可分离。但由于强调“合一”,并缺少将客体充分对象化而产生了众多缺陷。今天,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互为他者,重新反观自己,通过对话而生成进一步的互识、互证和互

补并将其推延至全球,必将是人类相互理解、构建和谐社会、造就人类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起点。

二、生成性对话的矛盾和难点

对话并不只是为了感情和兴趣,它首先是为了能共同生存下去。进行这样的生成性对话不能不碰到以下的矛盾和难点。

第一,普遍与特殊的矛盾。这种矛盾首先表现为后殖民时代一部分获得独立的国家的人民急于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坚持封闭狭隘的民族主义,他们认为一切被指为“普遍”的东西多是独断的、僵化的,并有强加于人的暴力倾向;他们反对任何结构性制约,反对任何中心,或者急于使自己成为中心,如中国的“东风压倒西风”论。另一方面,某些强势文化认为自己的文化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是可以覆盖其他各民族文化的普适文化。如中国五十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灌输。那么,文化的普世价值究竟是否存在呢?

中国哲学早就强调“易有三义——变易、不易和易简”^①。“变易”就是指因时、因地而变的特殊性,“不易”则是指不依时、地而变的普世性。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更是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证和发展。俄国思想家别林斯基在其《文学的幻想》一文中说得最清楚。他说:“只有遵循不同的道路,人类才能够达到共同的目标;只有通过各自独特的生活,每一个民族才能够对共同的宝库提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事实上,没有共同的目标(普世价值)就没有对话的必要和可能;没有各自独特的生活,也就没有了对话的内容,无话可对。例如民主称得上是一种普世价值,但对民主的理解和到达民主之路,却各有不同。各民族只有通过自己独特的道路,才能达到这一普世的目的。

然而在当前情况下,特殊性和普适性之间发生了深刻的断裂。这种断裂严重影响了各方面的和谐,使对话难以进行,社会难以发展。重新沟通和弥合这种断裂,回返普遍与特殊的正常关系,是发展多元文化、保护文化生态、缓解文化冲突的重要环节。

第二,在对话过程中,如何既保持原有文化的纯粹,又能接受其他文化的有益的影响,也是一个矛盾。要保存固有文化的主体意识,就会强调各种文化越“纯粹”、越“守旧”越好,但不同文化之间又不可避免地互相渗透、吸收。这种互

^① 《周易正义卷首》引郑玄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郑玄(128—200),见《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页。